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6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第22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场域适应与行为变迁

王 通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 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镇社会流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在此进程中,政府的容量平衡逻辑形成融城准入门槛,而流动人口以能动精神形塑渐次融城的市民化图景。但这种解释逻辑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内部差异以及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聚焦流动人口的主体视角,发现其内部的个体差异使其匹配不同的市民化阶段并表现出相应的市民化行为。因而,中国流动人口呈现渐阶融入的市民化图景。以信任为关键变量观察社会的转型特征,可以发现,伴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进阶,其普遍主义信任特征愈发显著;流动人口不仅成为"标准的城里人",也进阶性地成为"典型的现代人";流动人口市民化不仅超越了差序格局的信任半径局限,而且构成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潜在动能。

关键词: 流动人口市民化;社会流动;社会转型;信任变迁;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23)06-0115-11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等改革任务。同时,2019年,中央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首次以专门性文件部署社会性流动优化机制,并明确提出为社会成员提供"横向流动桥梁和纵向流动阶梯"等行动目标[1]。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论述中,明确将"破除阶层固化的体制机制障碍,畅通社会上升通道"作为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重要任务。这表明,畅通社会流动通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助力个人全面发展的时代课题。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当前"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1个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相关的人口规模大约占到中国人口总数的50%"[2];大规模社会流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使得传统的乡土中国"破土而出",呈现流动社会的转型特征[3]。在学术研究中,社会流动是个人试图改善其阶层状况的社会行为;聚焦中国场域,作为具有悠久农业文明的人口大国,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乡-城社会流动构成中国流动社会的主流形式[4]。社会流动不仅正在"改变中国",同时,也成为社会成员"创造性改变自己"的社会行动[5]。因此,作为流动人口"改变自己"的阶层行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必然成为优化社会流动机制和畅通社会上升通道的重要任务。这要求我们聚焦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具体过程以归纳其内在规律,并探究其"改变中国"的潜在能量。

一、流动人口的渐次融城

2013年,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到农民工等流动人口"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没有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等"玻璃门"现象,并将其列为中国城

收稿日期: 2023-08-09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3.06.0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1YJC810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项目(21FYB027)

作者简介: 王 通(1990—),男,山东东营人,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社会阶层、城乡关系。E-mail:wangtongcsu@163.com

镇化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6]。流动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玻璃门”问题,主要产生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及其制度惯性;在研究中,学术界主要以“半城市化”等概念来概括制度等结构性阻滞机制所产生的市民化困境[7]。但是,如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理论所述,“不应将结构仅仅等同于约束,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约束性和使动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8]18-23。其中,流动人口结合自身能力和既有资本,采取非线性的行动策略,有选择性地渐次融入城市并采取针对性的市民化行动,成为超越结构阻滞机制的能动行为,从而,形塑了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渐次融城图景。

(一)容量平衡逻辑形成融城准入门槛

如马克思所言,“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9]560。但是,在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实践中,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社会流动模式,“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9]828,并且“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法律”[9]846。基于对资本自由扩张的理论反思以及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现实考量,新中国自成立之初便开始以国家理性调控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流动人口。从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来看,“压力是由于系统的需求超载及容量增大而引起的”[10]。生活资料及就业机会等“容量压力”以及因流动人口增加而激增城镇运行成本等“内容压力”,可能会超越城镇社会的承载极限而产生系统压力。因而,有必要以调控进城流量等形式实现流动需求与城镇容量之间的平衡关系。

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农村人口的“进城热潮”,中央在《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同于城市的失业半失业人员……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国家各方面建设的发展,将要从农村吸收整批的劳动力,但这一工作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11]。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落户”后,中央规划以发展乡镇企业等形式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退出承包地的农民仍然留在农村从事各种专业生产。他们离开土地而不进城,叫做‘离土不离乡’。这和历史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剥夺农民,使他们破产,成为资本的廉价劳动力,是根本不同的”[12]。

以容量逻辑为主线的政策调控机制对于流动人口基于个人理性而做出的“进城决策”发挥了引导作用。但是,在城镇人口容量有限的情况下,该调控机制会产生阻滞效果。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等资源短缺促使中央政府实施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又引发了城乡隔离的制度,扩大工农差别。政府不得不限制城市人口数量,近80%的人口限制在农村,留在土地上”[13]。再如,优先发展重工业决定了其“吸纳就业能力的有限性,不仅无法带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甚至连城市居民就业都无法保证”[14]。此外,地方政府还会将流动人口的准入机制同其辖区的发展目标相契合,并根据外来人口的贡献大小赋予其差别化的市民待遇[15]。从结构化的理论视角看,结构是指“在某一固定范围内一系列可以允许转换的生成框架,以及左右这一生成框架的转换规则”[8]15。在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中,制度等结构因素构成形塑其市民化图景的“生成框架”或“转换规则”;而以容量为主线的调控机制以及以门槛逻辑为工具的准入机制,决定了流动人口需要跨越制度等结构性门槛来实现其市民化目标。

(二)个体能动精神建构渐次融城图景

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定义,能动性一方面是行动者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以及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行动者在行事时“维持通晓”的能力,即“当被他人问及时,能够提供自身活动的理由,以及知晓如何利用规则和资源以构成互动”[8]8。具体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这

种能动性主要表现为流动人口所扮演的“差序格局中的能动者”角色[16]。比如，流动人口以“半工半耕”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市民化风险，并以代际接力等形式分阶段实现市民化目标[17]。在“维持通晓”方面，有研究发现，对于“农村人”成为“城里人”的看法，不同代际的农民工均给出了相同的看法：经济层面的融入，即在城镇买房和工作是最重要的条件；其次是获得城镇户口等制度性因素；最后才会选择社会层面的融入，即选择与城里人结婚或者在城市有很多熟人[18]。在“做事情的意图和能力”方面，流动人口在市民化的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策略。比如，有学者发现，在谋求生存的城镇化阶段，流动人口看重由同质性群体组成的强关系，而在谋求发展的市民化阶段，流动人口则开始寻求由异质性群体组成的弱关系，即主动寻求融入城市[19]。

从市民化过程看，这种以理性选择为内在逻辑的非线性行动策略具有反向排斥等自我封闭特征。比如，有研究团队对全国 60 个城市的流动人口所进行的社会融合状况调查发现，本地人接受外地人的得分明显高于外地人（流动人口）接受本地人；流动人口在城镇社会融入中具有双向性选择，即反向观察，流动人口不愿意与本地人交往，但又认为本地人愿意与外地人交往；流动人口的交往对象往往局限于老乡或者朋友等血缘纽带或地缘纽带范围内；因为工作和生活需要不得不与本地人交往，但是在交往过程中，本地人并没有让其产生被排斥的感觉[20]。因而，融城准入门槛的存在决定了流动人口并非“线性进城”而是分阶段地完成其市民化目标。在心理认同方面，非线性行动策略会滋生拒斥市民化等行为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可能会伴随制度化市民身份的进步，如户籍身份的进步而趋于消解。也就是说，流动人口的能动精神超越了融城准入门槛等结构性因素的约束，但是，不论是在市民身份建构方面还是在城市心理认同方面，分阶段的非线性行动策略均形塑了流动人口渐次融城的市民化图景。

（三）渐次融城解释逻辑的视角拓展

政府的容量平衡逻辑形成融城准入门槛，个体的能动精神形塑渐次融城图景，这构成学界对于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渐次融城解释逻辑。从结构二重性理论进行解读，这种解释逻辑分别从结构与行动两个维度建构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图景。容量平衡逻辑的论点强调制度等结构因素对于流动行为的约束作用，但是，忽视了结构的自我优化属性，如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优化社会流动机制和畅通社会上升通道方面的系列改革措施；同时，该解释逻辑忽视了流动人口的能动作用，从而具有实践滞后性和理论片面性等双重不足。个体能动精神的论点强调流动人口对于结构场域的适应，尤其是根据政策调控来调适个人行为，却忽视了行动对于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作用。比如，大规模社会流动推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发生转变并构成形塑社会结构的巨大力量[21]。因而，解读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深层逻辑，则需要以结构与行动的互动关系为主线，拓展渐次融城解释逻辑的分析视角。比如，从流动人口的主体视角反向观察公共政策的形塑作用，并进一步归纳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内在特征。

其次，个体行动对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是社会流动所蕴含的强大动力。当前学界主要以“乡土社会向城乡中国转型”来界定社会流动的“再生产”功能，但是，如何表征社会流动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过程，则需要新的理论探索。本文拟从信任变迁等文化视角进行理论拓展。因为大规模社会流动产生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根据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伴随现代化进程，社会的信任模式会从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从特殊主义信任向普遍主义信任发生深刻转变。在乡土中国，中国社会呈现乡土性特征，“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22]6“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22]25；作为其文化特征的差序格局，根基在于不流动，这构成乡土中国的信任机制[23]。而在城乡中国，流动的现代性是对固态现代性的“液

化、溶解和熔炼";同时,流动态的现代性要求流动人口"运用他们新的自由去寻找合适的位置……遵守公认为正确的、合适的行为规则和行为方式",并培养"与差异共处的能力"[24]32。这构成普遍主义信任的文化特征。如果伴随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的进步,其个体所具有的普遍主义信任特征愈发显著,则可证明社会流动等行动对于社会结构具有"再生产"作用。

二、流动人口市民身份建构的渐阶融入

从渐次融城图景看,中国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是分阶段融入城市的过程:告别农业劳动向非农产业转移并长期居住在城镇社会的非农化阶段;获得城镇社会的户籍身份以实现身份转变的城镇化阶段;在获得城镇户籍身份的基础上实现城镇社会及市民角色认同的市民化阶段。渐次融城图景是在公共政策形塑和个人行为调试双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是,公共政策的形塑对于不同个体是否会产生相同效应,进而,是否所有的流动个体都沿着渐次融城的行动逻辑实现市民化目标? 为此,本文聚焦流动人口的内部分化,寻找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深层特征,并以此实现对渐次融城解释逻辑的主体视角拓展。

(一)数据分类:流动人口市民身份建构的内部分化状况

城乡身份和区域身份的双重转变构成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制度标准,同时,也是最容易通过客观数据进行描述的市民化过程。以"户口的城乡登记状态"和"是否为人户分离人口"等可以有效区分中国社会成员的城乡身份和流动状态;不同的转户机制,如通过升学、参军等自致性机制获得城镇户口,还是通过征地、户口改革等外部性机制成为城镇居民,可能产生不同的市民化状态。为此,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的数据,对中国社会成员的流动状态进行类型划分。其中,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共有样本12582份。根据研究需要,剔除户籍状态中"没有户口""其他""不知道""拒绝回答"等无效样本150份,剩余有效样本12432份。为了解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中的户籍影响程度、主观感知情况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情况,本研究选取相应的指标(具体参见表1)进行描述,并剔除"拒绝回答""不知道"等无效样本1224份,剩余有效样本11208份。

对于中国社会成员流动状态的内部分化,本研究采取以下分类方法进行识别和描述:(1)根据"当前户口登记状态"将样本划分为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两种类型;(2)在农村人口中,依据"是否为人户分离人口",将农村人口划分为农村非流动人口和联根式流动人口(保留农村户籍的乡-城流动人口);(3)在城镇人口中,将"后天获得城镇户口"(即在"是否出生即为城市人口"中回答为"否"的样本)划分为脱嵌式流动人口(通过升学、参军、经商等主动市民化机制获得城镇户籍身份)和发展式流动人口(因征地、户籍制度改革等被动市民化机制获得城镇户籍身份);依据"是否为人户分离人口"将"出生即为城镇户口"的群体(即在"是否出生即为城市人口"中回答为"是"的样本)划分为城镇非流动人口(非人户分离人口)以及城-城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两种类型。具体如表1所示①:

① 分类依据分别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中的A18,并将户口登记状况为农业户口的归类为农村人口,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和军籍归类为城镇人口;A21中户口登记地为本乡(镇、街道)的样本归类为非流动人口,其他有效样本归类为流动人口;A20中通过"升学、参军、工作、转干、家属随迁"等后天机制获得非农户口的样本归类为脱嵌式社会流动,而通过"征地、户口改革"的样本归类为发展式社会流动。样本中的"没有户口""其他""不知道""拒绝回答"等为无效样本。关于联根式流动人口、脱嵌式流动人口和发展式流动人口的定义,参见王通. 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天津:南开大学,2019:128-134.

表 1　中国社会成员流动状态的类型划分

类型	农村非流动人口	联根式流动人口	脱嵌式流动人口	发展式流动人口	城－城流动人口	城镇非流动人口
数量	4664	1391	1479	516	1234	1924
占比/%	41.61	12.41	13.20	4.60	11.01	17.17
城镇户口获得难度	3.38	3.15	2.70	2.71	2.93	2.78
户籍影响福利程度	3.72	3.84	3.49	3.55	3.61	3.39
生活幸福感	3.76	3.78	3.99	3.91	3.95	3.98
基层选举权	1.41	1.86	1.68	1.37	1.72	1.58
医疗保险	1.06	1.13	1.08	1.05	1.08	1.06
养老保险	1.32	1.43	1.20	1.21	1.20	1.18

从表 1 可以看出,农村非流动人口和城镇非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 41.61% 和 17.17%,总计为 58.78%。这就意味着,中国当前有超过 40% 的社会成员正处于流动状态或者曾经有过流动经历,流动社会的到来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事实。同时,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乡－城流动人口,即表格中的联根式流动人口(12.41%,数据为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同)、脱嵌式流动人口(13.20%)和发展式流动人口(4.60%),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 30.21%,在流动人口(总人口去除农村非流动人口和城镇非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为 73.29%。这表明,流动人口市民化已不仅仅是社会成员改变自身阶层属性的个体行为,而且构成畅通社会上升通道并助力个人全面发展的施政任务。

从乡－城流动人口内部看,尚未获得市民户籍身份而仅处于非农化阶段的联根式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 12.41%;获得城镇户籍身份而处于城镇化阶段的流动人口中,以被动机制实现市民化的发展式流动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为 4.60%,而以主动机制实现市民化的脱嵌式流动人口的比重则为 13.20%。这种内部分化特征可能来自于流动人口因进城的时间差异而形成的阶段性分殊,但更可能在于公共政策的形塑作用在不同群体中产生的进阶型分化。如果后者成立,则这种进阶型分化来自于流动人口的个人能力、社会资本、能动精神等综合素质分殊。为此,我们可借助不同类型流动群体对于跨越融城准入门槛的难度认知差异进行论证和探索。

(二)流动人口对市民化难度认知呈现进阶分化特征

在齐格蒙特·鲍曼对“现代性”的描述中,“固态”阶段现代性的核心是控制和固定,而在“流动”阶段的现代性中,“旧有的结构、格局、依附和互动模式的传统”需要被“扔进熔炉以得到重新铸造和形塑”[24]31。对于社会流动而言,固态管理机制将人固定在特定地域以实现控制,而个人进入新的地域则需要获得准入资格;既有的流动社会治理机制尚未超越固态管理机制,并呈现“模糊的属地化管理”等政策执行偏差[25],使得流动人口真切感受到融城准入门槛的现实难度。从表 1 可以看出①,处于不同阶段的流动人口对于市民化的难度认知呈现进阶分化的内在特征。

1. 越处高阶的流动人口,越看低“跨越融城准入门槛”的难度

首先,从融城准入门槛的影响来看,容量平衡逻辑及其对应的固态管理机制确实对流动人口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中的 A27k:“农村人获得城市户口很难”和“户口在本地享受的福利待遇有很大差别”,数值越大代表影响认知越高;A36:“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数值越大代表幸福感越高;A44:“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数值越大代表参会机会越少;A61:“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数值越大代表参与度越低。“分析样本”的数据为不同(非)流动状态群体的平均值。

的基本权利保障产生了实质影响。比如,从基层选举权来看,具有流动特征的联根式流动人口(1.86,数据为均值,下同)、城-城流动人口(1.72)和脱嵌式流动人口(1.68)"缺席"选举的经历均多于固地态群体,如城镇非流动人口(1.58)、农村非流动人口(1.41)和以被动市民化机制获得城镇户籍但保留原有居住形态的发展式流动人口(1.37)。也就是说,越是人户分离状态的流动人口,越少参加基层选举或直接没有选举资格。但是,从流动人口内部分化来看,融城准入门槛对于不同类型流动人口所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比如,从"城镇户口获得难度"的认知均值看,农村非流动人口(3.38)和联根式流动人口(3.15)对于户籍准入的难度认知高于其他群体;脱嵌式流动人口(2.70)和发展式流动人口(2.71)对于户籍准入的难度认知则低于其他群体。其中,以升学、参军等主动市民化机制跨越城镇户籍门槛的脱嵌式流动人口对于"城镇户口获得难度"的认知最低。这表明:越是拥有"跨越城镇户籍门槛经历"的群体,越看低获得城镇户口的难度。

2.越处高阶的流动人口,越看淡"户籍身份影响福利"的程度

流动社会治理机制的不完善增加了保障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现实难度。但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等,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流动社会治理不完善等市民化保障短板。如从不同群体的医疗保险保障情况来看,除处于非农化阶段的联根式流动人口(1.13)参与偏低外,其他群体几乎处于相同水平;而在养老保险的权利保障中,除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村非流动人口(1.32)和联根式流动人口(1.43)外,其他群体几乎处于相同参保水平。这也意味着,处于城镇化阶段的脱嵌式流动人口和发展式流动人口获得了基本的市民化权利。从流动人口对于"户籍影响福利"的程度感知看,处于非农化阶段的联根式流动人口(3.84)的"影响感知"最高,其次为发展式流动人口(3.61),而脱嵌式流动人口(3.49)的"影响感知"最低;从生活幸福感来看,处于城镇化阶段的脱嵌式流动人口(3.99)和发展式流动人口(3.91)的幸福感远高于处于非农化阶段的联根式流动人口(3.78)。从中可以看出,越处高阶的乡-城流动人口,其对户籍等影响福利的感受越低,同时,在城镇社会的幸福感越高。

(三)渐阶融入:进阶型市民化的主体视角总结

融城准入门槛将流动人口市民化形塑为非农化、城镇化和市民化等不同阶段,而流动人口以能力与需求相匹配作为行为策略实现"梯度进城"[26]。如果说渐次融城是对流动人口市民化制度场域的客观描述和理论总结,那么,渐阶融入则是对流动人口市民化个人行动的特征归纳,是对渐次融城的主体视角拓展和理论内涵延伸。其一,流动人口所处的市民化阶段,同其个人能动机制相匹配,如个体能力、社会资本、能动精神等;并且,市民身份建构程度越高,融城准入门槛等制度因素对其市民化的影响越弱。比如,越是跨越了户籍门槛的群体,其市民化难度认知越低。当然,这种市民化阶段的差异也可能来自个人的理性选择,因为并非所有流动人口都有永久市民化意愿。比如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上半程"意味着流动人口挣脱乡土的束缚;在"下半程"则意味着流动人口回归乡土并构成重塑县域社会空间的重要动力[27]。其二,处于不同的市民化阶段,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市民化行为。比如,如非农化阶段相互对立、相互防范的"二元社区状态";城镇化阶段相互包容、正向互动的"敦睦他者状态"以及市民化阶段将彼此视为平等成员的"同质认同状态"[28]。

三、流动人口信任模式的进阶分化

从非农化向城镇化的身份进阶意味着流动人口户籍身份的转变;而理想的市民化状态,除了要求流动人口获得城镇户籍身份外,还要求其实现对城镇社会及市民角色的认同。既有研究倾向于从行为方式及消费习惯等角度来衡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认同程度。但是,这种以城镇标准同化

流动人口的社会化逻辑,其前提假设在于城镇社会是现代化场域并且城镇居民均符合现代化标准。在这种假设尚未得到证实之前,本文认为应该以现代化的标准而非仅仅以城镇文化标准来衡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即要求流动人口成为“标准的城里人”外,更要成为“典型的现代人”。其中,从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转变、从特殊主义信任向普遍主义信任转变构成学界衡量社会现代化的文化标准。根据相关研究,中国社会已经呈现上述转型特征,如尽管中国的总体信任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也呈现出普遍性信任上升而特殊性信任下降的转型特征[29]。聚焦不同群体的信任水平差异,有研究发现,户籍等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成员的信任变迁呈现群体分化特征,如城镇常住居民的普遍性信任上升而特殊性信任下降,但是,流动人口的普遍性信任和特殊性信任均呈现下降趋势[30]。因此,聚焦流动人口内部的信任分化,可以有效说明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进阶的行为特征。

(一)城镇社会的开放性接纳与流动人口的进阶性融合

从信任模式的变迁来看,伴随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化的进步,社会的信任模式会从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转变,或者从特殊主义信任向普遍主义信任转型。人格信任或者特殊主义信任依赖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人格化纽带,是具有排他属性的信任模式;而系统信任或普遍主义信任依赖于法治等专家系统或者依赖于信用等符号系统,是具有包容属性的信任模式。在差序格局信任模式下,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呈现信赖自己人但是防范外人的“内外有别”特征。假定城镇社会是熟人社会场域,流动人口作为“陌生人”或“外人”会受到排斥或者被防范;那么,作为陌生人涌入的城镇社会,其居民可能呈现高度防范的低度信任状态。为探究流动社会背景下中国城镇社会的信任特征,本部分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社会态度”中 A34 问题,即“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您一不小心,别人就会想办法占您的便宜”,以此来观察不同(非)流动群体的防范心。其答案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李克特五点量表,数值越高表示该样本的防范心越强。对不同(非)流动群体防范心的差异性进行最小显著性差异法(LSD, 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的方差分析,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非)流动群体防范心的最小显著性差异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防范心	组 间	225.693	5	45.139	1.677	0.136
	组内	301474.360	11202	26.913		
	总计	301700.053	11207			
(I)类型	农村非流动人口	城镇非流动人口	联根式流动人口	发展式流动人口	脱嵌式流动人口	城-城流动人口
(J)类型						
农村非流动人口		-0.102;0.467	0.312*;0.049	-0.222;0.357	-0.163;0.292	-0.092;0.581
城镇非流动人口	0.102;0.467		0.414*;0.023	-0.119;0.642	-0.061;0.735	0.011;0.955
联根式流动人口	-0.312*;0.049	-0.414*;0.023		-0.534*;0.046	-0.475*;0.014	-0.404*;0.047
发展式流动人口	0.222;0.357	0.119;0.642	0.534*;0.046		0.059;0.825	0.130;0.633
脱嵌式流动人口	0.163;0.292	0.061;0.735	0.475*;0.014	-0.059;0.825		0.071;0.721
城-城流动人口	0.092;0.581	-0.011;0.955	0.404*;0.047	-0.130;0.633	-0.071;0.721	

注:1. * 平均值差值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2. 交叉表内数据为:[平均值差值(I-J);显著性],如 0,102;0.467。

表 2 的数据显示:不同(非)流动群体之间防范心的差异系数为 0.136,这表明不同(非)流动群体之间的防范心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因流动人口到来而形成的陌生人社会并不属于彼此防范或者彼此排斥的低度信任场域;城镇社会的信任场域呈现明显的开放性特征,这构成市域

社会治理,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市民化身份建构的良性社会资本。作为现代化的"发生场域"或"承载场域",中国城镇社会的信任模式呈现陌生人社会特征。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所言,"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世俗的不经意是在与陌生人相遇时当面承诺的最基本类型……具有霍夫曼所说的'无焦点互动'的特征。与(熟人社会中的)'焦点式互动'是相当不同的"[31]71-72。

从具体分组的对比看,联根式流动人口的防范心同其他类型社会成员均呈现显著的差异;如果以联根式流动人口为参照群体(即表格中的I类型),那么该群体与其他类型社会成员的平均值差值均为正值,即联根式流动人口的防范心要高于其他类型社会成员。这意味着,作为陌生人"闯入"城镇社会同时又缺失城镇户籍身份的联根式流动人口,其信任机制呈现反向排他特征。但是,处于城镇化阶段的脱嵌式流动人口和发展式流动人口以及城-城流动人口,他们同城镇非流动人口的防范心差异并不显著。这说明,伴随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的进阶,其自我封闭的排他性特征会减弱;这同时也暗示,在进阶型市民化进程中,伴随市民化程度加深,他们同城镇居民的互动关系也会告别二元社区状态并进入敦睦他者阶段和同质认同阶段。

(二)社会流动经历具有扩展信任半径的进阶效用

以蜂窝状为结构特征的差序信任,其信任半径局限于血缘纽带或地缘纽带,具体表现为对"外人"的排斥和防范。但是,这种不信任是一种"起点上的不信任,而非永远的不信任"[32]。在这种信任模式下,融入特定的熟人社会要求外来者进行"自己人"身份的建构,并且"内外互化的结果不是形成内外心理群体而是形成同化性心理身份"[33]。但是,从信任角度看,流动社会是对蜂窝状组织结构的冲击,要求社会成员突破差序格局的信任半径局限,并表现出社会交往的开放性。因而,将"自己人"身份建构视为社会融入的关键指标,甚至将"自己人"身份建构等同于市民化身份建构,其实质是以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信任逻辑解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而大规模社会流动在推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同时,构成推动城镇社会从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向普遍主义信任模式转变的关键动力。为此,本部分借助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社会态度中A33问题:"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其答案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李克特五点量表,数值越高代表该样本的信任度越高。对不同(非)流动群体的信任度进行最小显著性差异法(LSD, 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的方差分析,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非)流动群体信任度的最小显著性差异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信任度	组间	39.594	5	7.919	7.533	0.000
	组内	11776.160	11202	1.051		
	总计	11815.754	11207			
(I)类型	农村非流动人口	城镇非流动人口	联根式流动人口	发展式流动人口	脱嵌式流动人口	城-城流动人口
(J)类型						
农村非流动人口		-0.079*;0.004	-0.165*;0.000	-0.035;0.464	0.019;0.541	-0.085*;0.010
城镇非流动人口	0.079*;0.004		-0.085*;0.018	0.045;0.381	0.098*;0.006	-0.006;0.878
联根式流动人口	0.165*;0.000	0.085*;0.018		0.130*;0.014	0.183*;0.000	0.079*;0.047
发展式流动人口	0.035;0.464	-0.045;0.381	-0.130*0;.014		0.054;0.307	-0.050;0.349
脱嵌式流动人口	-0.019;0.541	-0.098*;0.006	-0.183*;0.000	-0.054;0.307		-0.104*;0.009
城-城流动人口	0.085*;0.010	0.006;0.878	-0.079*;0.047	0.050;0.349	0.104*;0.009	

注:1. *平均值差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5;2. 交叉表内数据为:[平均值差值(I-J);显著性],如0.079*;0.004。

表 3 显示,不同(非)流动群体的信任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不同组别之间的显著性为 0.000。这表明,中国社会成员间的流动状态分殊产生了信任状况的分化。具体表现为:

城乡间信任模式差异明显,流动人口市民化需要进行信任文化转型。从表 3 可以看出,农村非流动人口与城镇非流动人口、联根式流动人口和城 - 城流动人口的信任度均存在显著差异。既然农村是差序信任的典型场域,上述显著差异表明,城镇社会的信任场域已经有别于差序格局信任模式,乡 - 城流动人口融入城镇社会需要适应新的信任文化;而联根式流动人口与农村非流动人口和城镇非流动人口之间同时存在信任度差异,表明这部分群体的身份认同处于城乡之间的过渡状态,"非乡非城"的身份属性导致其"异于乡亦异于城"的信任模式。

市民化户籍身份的进阶产生信任文化的升级。表 3 显示,城镇非流动人口与联根式流动人口和脱嵌式流动人口之间的信任度均存在显著差异;以城镇非流动人口为参照群体(即表格中的 I 类型),那么,其与联根式流动人口的平均值差值为正值(0.085)而与脱嵌式流动人口的平均值差值为负值(-0.098)。这表明,在进阶型市民化进程中,处于非农化阶段的联根式流动人口,其信任状态呈现明显的反向排他特征;伴随市民化程度的进阶,实现相对彻底的市民化目标,如脱嵌式流动人口的信任度所示,其与城镇非流动人口的平均值差值为正值(0.098)。即处于城镇化阶段的脱嵌式流动人口,不仅没有反向排他特征,反而超越了城镇原居民的信任水平。这充分说明,伴随流动过程,流动人口逐渐脱嵌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信任逻辑;伴随市民化过程,流动人口开始接受城镇社会的信任文化,实现信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流动人口的非农化、城镇化和市民化等流动经历有效拓展了该群体的信任半径,并构成推动城镇社会信任模式升级的结构性动力。

(三)流动社会是对差序格局信任模式的超越

对于流动社会与社会信任的影响关系,有研究发现,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流动是我国社会信任水平下降的重要成因[34]。该结论同中国差序格局的信任逻辑相契合,即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往往难以获得流入地的接纳或信任。如孔飞力在《叫魂》中所言,"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35]。但是,本研究对此结论的质疑是,某些信任指标的降低是否意味着社会信任水平的实质性下降。因为从社会成员的防范心来看,社会成员间彼此防范的特征并不显著,并且城镇社会的信任场域呈现开放性特征。从社会成员的信任度来看,城镇社会的信任模式已经区别于农村的差序信任格局而呈现陌生人社会的特征;伴随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的进阶,其信任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即超越了差序信任格局的信任半径局限而呈现包容性特征。因而,看似人际关系的疏远或许意味着信任系统的升级。

也就是说,流动社会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意味着社会成员信任模式的转型,即以包容性信任模式超越差序格局信任模式的信任半径局限。比如,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以适度隔离的文化性融合实现"分得清亦合得来"的结构性融合模式[36]。综上所述,流动社会背景下的流动人口市民化并非仅仅意味着流动人口成为"不折不扣的城里人",而是要求其在实现"城里人"认同的同时,也要成为典型的"现代人"。从流动人口的进阶型分化来看,伴随流动人口户籍身份的进阶,其文化特征,尤其是信任特征,也会呈现向现代化转型的典型特征。

四、总结

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社会流动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在中国,政府以容量平衡逻辑为主线对流动人口进行政策调控产生了融城准入门槛;社会成员发挥能动精神创造了非线性进城的流动路径。政府公共政策与个体能动精神共同形塑了渐次融城的市民化图景。但是,该解释

路径忽视了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社会流动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功能;同时,将渐次融城行为解读为流动人口根据政策场域所进行的行为调试,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内部差异。以流动人口的主体视角进行研究拓展,可以发现,不同流动人口的个人能力、社会资本以及能动精神等综合差异使其匹配不同的市民化阶段并表现出相应的市民化行为。如跨越城镇户籍门槛的脱嵌式流动人口更加看淡户籍因素对社会融入的负面影响,也更加淡化户籍因素对于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制约作用,进而在城镇社会表现出更高的幸福指数。这意味着,流动人口要实现市民化进阶就需要提升个体的综合能力。以信任为关键变量对社会结构转型进行文化表征,可以发现,伴随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的进阶,其普遍主义信任特征愈发显著,呈现信任模式的现代化转型特征;非农化、城镇化、市民化等渐次融入经历具有拓展信任半径并超越差序格局信任模式的潜在力量。这意味着,流动人口市民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比如,其推动形成的流动社会是对差序格局信任模式的超越;流动人口在实现市民化目标的过程中,不仅适应城镇社会既有的互动场域,成为“标准的城里人”,也实现了信任等行为模式的转型,成为“典型的现代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
[2]肖子华,刘金伟.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No. 1[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6-10.
[3]麻国庆. 破土而出:流动社会的田野呈现[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
[4]王通. 脱嵌式社会流动:中国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制度逻辑[J]. 求实,2022(3):59-74.
[5]徐勇. 农民改变中国[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3.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89.
[7]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5):107-122.
[8]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 李康,李猛,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9]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王浦劬,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92-293.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44.
[13]杜润生.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47-148.
[14]陈斌开,林毅夫.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社会科学,2013(4):81-102.
[15]李丽梅, 陈映芳, 李思名. 中国城市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2):52-60.
[16]王毅杰, 赵晓敏. 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基于2010年和2017年的比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1):117-126.
[17]夏柱智. 能动的主体: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青年——基于中部Q镇的田野调查[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11):75-80.
[18]李培林. 当代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1.
[19]柯兰君,李汉林. 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58-67.
[20]肖子华,徐水源,刘金伟.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No. 2[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234.
[21]周其仁. 城乡中国[M]. 修订版.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VIII.
[22]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3]翟学伟. 从社会流动看中国信任结构的变迁[J]. 探索与争鸣,2019(6):20 - 23.
[24]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M]. 欧阳景根,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5]王清. 模糊的属地化管理:政策执行偏差的一种解释——以流动人口服务供给为例[J]. 探索, 2021(3):129 - 141.
[26]黄佳鹏. 梯度进城:青年农民工的城市化实践[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53 - 62.
[27]焦长权.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22 - 39.
[28]马西恒,鲍勃·谢比伯等. 中加社区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以上海和温哥华为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184 - 186.
[29]齐亚强,张子馨. 转型社会中的人际信任及其变迁[J]. 社会学评论,2022(2):124 - 144.
[30]韩彦超. 转型期人口流动与信任变迁(2005—2015)[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08 - 116.
[31]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71 - 72.
[32]彭泗清. 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J]. 社会学研究,1999(2):55 - 68.
[33]杨宜音. "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1999(2):40 - 54.
[34]吕炜,姬明曦,杨沫. 人口流动能否影响社会信任——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动态,2017(12):61 - 72.
[35]孔飞力. 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2:49.
[36]熊万胜,严子泳. 结构性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新形态[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1 - 11.

Field Adaptation and Behavioral Change for the Citizen Ident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ANG T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The large-scale flow of rural population to urban society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In this process, the government's capacity balance logic forms the access threshold of the city, a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hapes the citizenization picture of the city with a dynamic spirit. However, this interpretation logic ignores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Focusing on the main perspectiv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ts intern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ake it match different citizenization stages and show corresponding citizenization behaviors. Therefore, it presents a citizenization picture of gradual integration. Taking trust as the key variable to observe the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ety, it can be found tha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itizeniz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ts universal trust characteristic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not only becomes standard 'city people', but also become 'typical modern people' step by step; the citizeniz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not only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 of the trust radius of the differential pattern, but also constitutes the potential kinetic energy of China's soci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itizen-ident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ocial mobili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transition in trust; urban social integration